

中国革命史讲义

(二)

胡华主编

(校内用书)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一九七八年九月

第 二 編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目 录

第 二 编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三章 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高涨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

第一节 革命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反帝运动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1

第二节 五卅反帝运动和全国反帝大浪潮的掀起……………29

第三节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蒋介石对革命的阴谋篡夺……………43

第四节 毛泽东同志所著《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发表……………62

结 语 ……………75

第四章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 (一九二六年七月 至一九二七年四月)

第一节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78

第二节	毛泽东同志所著《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书的发表.....	90
第三节	上海工人的三次起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阴谋.....	108
结 语		119

第五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紧急阶段，革命的失败（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一九二七年七月）

第一节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的局部失败.....	121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对革命的危害.....	129
第三节	从蒋介石集团的叛变到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的失败.....	139
结 语		144

第三章 革命統一戰綫的形成 和革命运动的高漲

(一九二四年一月至一九二六年七月)

第一节 革命統一戰綫的形成和反帝运动 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召开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经济状况〕

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际环境的基本特点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稳定和资本主义各国的暂时稳定。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稳定。

这一时期，苏联正在积极建设社会主义。从一九二一年经济恢复时期开始到一九二五年底，由于正确执行新经济政策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就。这时苏联的工农业生产已接近战前水平，并开始了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斗争的新时期。到一九二七年末，工业和全部农业（包括森林业和渔业在内），就其生产总量说来，已经超过了战前水平。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增加到百分之四十二，工业中的社会主义部分则已占到百分之八十六，苏联迅速地向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苏联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稳定是健全的，是日益巩固的。

苏联的稳定和巩固，大大地推动和帮助了世界革命，特别

是中国革命的发展。这是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有利的国际条件。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一切帝国主义者都反对我们，只有苏联援助了我们。”①

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欧战以后爆发的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坚强领导，由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反动领袖对于资产阶级的帮助，在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间，相继被资产阶级残酷地镇压下去。资本主义各国暂时逃出了战后经济危机和革命来潮的时期，而进入到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时期。到一九二五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生产量差不多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到一九二七年则已小步地越过了战前水平，同时，有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的一部分生产，则越过战前水平向前跳跃式地前进，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如在一九二六年，美国的制造业出产量已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二，开采业出产量已等于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全世界和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额指数，整个说来，都已接近战前水平，而在某些国家，例如美国和日本，则已越过了战前水平。此外，资本主义各国在改善生产技术方面，在技术进步方面，在生产合理化方面也都有所进步。

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暂时的局部的稳定中，存在着和发展着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五种基本矛盾，这就是：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势力与殖民地及附属国解放运动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大战中的战胜国与战败国间的矛盾；各个战胜国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全体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这些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使资本主义的暂时稳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9页。

定局面极不稳固。其中特别是由于战后美国成为全世界财政资本剥削的中心，欧洲是以自己在财政上服从美国为代价换得暂时稳定局面的，欧洲各国每年向美国支付巨额债款和利息，这就使赋税负担无限增加，使工人生活状况日益恶化；这就使殖民地人民受到更残酷的剥削，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危机加深起来，使人民生活恶化下去；这就会强制地向德国索取巨额赔款去支付美国债款，使德国经济恶化，失业现象增长。同时，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发展的不平衡，生产能力增长和市場划分的相对稳定之间的矛盾，使主要资本主义各国间爭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市場霸权的斗争也日益尖锐化。这样就使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帝国主义各战胜国之间、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人民之间的矛盾更为加深和发展了。这个时期內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问题还不是迫切的问题，而中国、印度、埃及、叙利亚、摩洛哥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却正在一步一步地增长起来，尤其是約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运动，搖撼着帝国主义的基础。总之，在资本主义暂时稳定局面中，现代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种种矛盾正在变本加厉地发展，预示着新的经济危机和新的革命高潮必然到来。

然而，世界资本主义这种暂时稳定局面却也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困难。因为，各帝国主义间在这时还没有严重的分裂和战争，它们能够暂时地结成反革命的统一战线，来干涉和破坏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中国的革命运动。这是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不利的国际条件。正如斯大林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中国革命问题》一文中所说：“帝国主义基本上是以统一战线来进攻中国革命的，现时在帝国主义者中间已沒有像十月革命以前存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削弱了

帝国主义的那种分裂和战争，——这一事实说明中国革命在走向胜利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要比俄国革命多得多，在这一革命进程中，投敌和叛变的事件也将比苏联内战时期多得多。”^①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在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下，中国工业发展陷入停滞状态。中国主要的民族工业——纺织业的纱锭数，一九二一年占全国中外纱锭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点四，一九二四年下降为百分之五十九点七，一九二七年又降为百分之五十七点四。布机数一九二一年占全国中外布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五，一九二四年下降为百分之五十八点三，一九二七年又降为百分之五十点三。

从绝对数来看，民族纺织业虽有轻微的发展，但是，就是在这些企业中，有许多却由于向帝国主义贷款而被吞并，或是以委托经营、租办、中外合办等名目而被掌握垄断，它们实际上已成为外国资本所有。例如，从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借外债的纱厂有十二家，委托经营及合办的有四家；除去结果不详的四家外，其余十二家都先后被帝国主义所吞并。这十二家拥有纱锭数四三八、八七三枚，接近于从一八九〇年到一九一三年二十四年间华商纱锭发展的总数。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机械入口数量的减少和停滞，也说明了工业发展的低落和停滞状况。如下表：

年 代	价值（单位：海关两）
一九二四	二三、七〇二、二四三
一九二五	一六、七二〇、八〇六
一九二六	一八、三九三、六〇二
一九二七	一九、七四三、〇九六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00页。

此外，洋米的輸入從一九二四年的六千三百餘萬海關兩，增到一九二七年的一億零七百萬海關兩。人民對工業品的購買力極其薄弱。因此，民族工商業在帝國主義資本的排擠吞併以及國內市場日益縮小的情況下，面臨着更加困難的境地。這就決定了從一九二四年開始的革命高潮的形勢下，民族資產階級能夠接受反帝反封建的綱領，在一個時期內、在一定程度上參加中國工人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由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掠奪的加劇，造成了中國農村經濟的雕敝，農民受到更加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土地更集中於少數軍閥、官僚、地主的手中。例如黑龍江的吳俊陞，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間，“攫取的土地几遍全省”；^①山東“土地以二元一畝的廉價，集中於王占元、潘復等大地主”；^②原中農占多数的河北，變成了“十萬畝以上的大地主占有土地的最大部分”；^③江蘇無錫的田地也“均為富紳所吸收”。^④到一九二七年，全國的土地占有狀況，據估計：無地和少地（十畝以下）的農民，占農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五，僅占有土地百分之六；而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十四的地主富農，却占有土地的百分之八十一。隨着土地的日益集中，地租剝削也不斷地加重。例如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七年，江蘇十八個縣市的貨幣地租就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四點九，同時有押租的田，押租額也增加了。隨着地租榨取的加重，農民就越要受到高利貸殘酷的剝削，一九二七年，陝西農民的百分之八十，都成了高利貸的債務者。一九二六年江蘇江浦的江村，三十六戶中，只有兩戶不負債，其餘多者負債八、九百元，少者一、二百元。因此，“藝谷者，谷未登場，已被債權者作為償息。值棉者，棉未開鈴，已拋售無余”。^⑤除高

①②③④ 《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集，第15—16頁。

⑤ 《合作通訊》第18期，1927年1月10日。

利贷剥削外，农民还要受到商业资本垄断物价、买贱卖贵的掠夺。一九二六年四川成都平原谷价，青黄不接时，每石高至二十八元，而到秋季收谷时，则每石低至十元。河北省束鹿县出产的棉花，农民只能得到销地天津价格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七。这些高利贷资本和商业资本是带有浓厚的买办性的，帝国主义通过它们大量掠夺中国的农业原料和进行商品倾销，进行抢掠式的不等价交换。从江苏武进农民所得与所付的物价来看，以一九一〇至一九一四年的物价指数为一百，到一九二七年，农民出卖的干茧价格指数为一百二十五，而输入的煤油则增至一百九十八，竹布更增至三百零六了。由此可见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剥削的凶残。同时，各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操纵各派军阀进行内战，如一九二四年的江苏浙江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一九二五年的浙江奉天战争，奉直两派联合进攻国民军的战争等等。因此军费不断增大。一九一六年北洋军阀政府的军费就达一亿五千多万元，一九二七年更增至七亿元。因而更加紧对人民的搜刮，捐税增加了六、七倍以上，还要预征田赋，一九二六年河南已预征至一九二九年，陕西预征至一九三一年，四川的梓潼更预征至一九五七年了。此外还增发公债，滥发纸币和滥铸硬币，变相地增加苛捐杂税。兵差则无论在种类上、地域上或数量上，也都比以前增加和扩大了。军阀混战还给人民财产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这一切，都主要地落在农民头上。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掠夺的加剧，地租、高利贷和商业资本剥削的越来越残酷，加以军阀战争的损害，从而造成农业生产的下降，农村雕敝，农民破产，饥民千百成群，以草根树皮为食。这种悲惨痛苦的遭遇，不能不激起广大农民对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反抗。他们一旦得到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必然要出现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农民运动高潮。

总之，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在发展着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和民族危机密切地结合着。全国性的大革命高潮正是在这个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每一省由孙中山指定三人，每一省又另推举三人。共产党人毛泽东、李大钊、林伯渠等同志都出席了大会并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

大会正式通过了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参加国民党。由于改组前的国民党政治方向极不明确，其组织内部又非常复杂和不统一。为了把这个党改造成成为工、农、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并保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国民党内外领导作用，从而领导这个革命的统一战线组织，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这是必需的、正确的。

大会又通过了新的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各项具体办法。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保留“总理”的情况下，把国民党的个人领导制度改为基本上的民主集中制，设立中央机构。只有这样，才能克服国民党组织的松懈散漫和没有中央组织的状态，才能担负起作为革命联盟的任务。

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参加起草的有名的宣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中分析了“中国之现状”，批评了国内反动的改良的各政派（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商人政府派）的错误主张，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张，提出了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革命的新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作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民主派的孙

中山对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提出的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发展中，本来存在着摆脱民族压迫，推翻专制独裁，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三大问题，当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旧民主主义时它还有革命的领导作用时，它也代表了人民的要求，提出了试图解决这三大问题的原则，这就是孙中山在一九〇五年出版的革命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发刊词》中最早提出的关于三民主义的思想。列宁曾指出：孙中山的思想是“目前已经完全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的思想”^①。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所以，旧三民主义思想庞杂，包含着许多互相矛盾的因素，不仅革命性极不彻底，而且存在着许多妥协改良和藐视人民的错误观点。

经过多次失败、挫折的教训，孙中山终于找到了新的道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篇《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就是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三民主义。孙中山在这篇《宣言》中说：“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所以，除了这篇宣言和政纲之外，其余的三民主义，都是旧三民主义，过时了的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伪释”。

新三民主义的特点：第一，是革命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结合了起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就是要同列宁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要同中国共产党联合，要依靠广大工农群众，这是新三民主义的革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2页。

命灵魂和革命方法。

新三民主义的第二个特点是三民主义有了崭新的内容：

（一）新的民族主义有了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的新内容。《宣言》指出：“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而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时，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清朝的种族压迫；清朝被推倒以后，民族主义便黯然无光，对外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而只有富国强兵，谋“国际平等地位”等模糊意识，对内还存在有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观点。

（二）新的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而对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则实行专政。《宣言》中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详言之，则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而在此以前，民权主义也只有“民主共和国”和“博爱、自由、平等”以至“护法”等空洞口号，很不彻底，很不明确。

（三）新的民生主义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办法。《宣言》中说：“民生主义，其最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一曰节制资本。”关于“平均地权”，在政纲中规定了“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后来孙中山在《耕者有其田》的演讲中，又进一步主张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作为“平均地权”的实际内容。关于“节制资本”，则规定凡有独占性质的大企业大银行归国家经营，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同时主张“制定劳工法，以改良工人之生活”，而在

旧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只有一个空洞的“平均地权”的政纲。

新三民主义的原则和纲领，和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基本上是一致的。因而这个《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政纲就成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革命统一战线的战斗旗帜。

但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还有不同的部分，就是：（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同。三民主义没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关于人民权力，在政纲中还有建国三时期之说，就是：孙中山根据其所著《建国大纲》，主张划分“建国”程序为三个时期：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他认为在和敌人作战的“军政时期”不能实行宪政，而在“军政时期”完结后，人民又必须经过一个“训政时期”，经过党政人员“训练”之后，才能行使民权，实行宪政。这是一种把人民看做愚笨的“阿斗”，不相信人民可以在民主的实践中学习行使民权的错误观点。这一错误主张，孙中山后来在《北上宣言》中已经放弃了。但是孙中山的叛徒蒋介石辈，在叛变革命后，却仍利用它来作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剥夺人民一切民主自由的借口。（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还有一个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三）宇宙观的不同。孙中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宇宙观或理论体系，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和共产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不同的。此外，在民族问题或其他问题的理论观点上，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也是不同的。（四）革命彻底性的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

革命的人们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即没有革命彻底性。

因此，共产主义者对于三民主义的正确态度应该是：一方面保护和发展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民主的方面，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二年曾经指出的那样：“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①用以团结和教育一切赞成三民主义的人们；另方面，则必须保持无产阶级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独立的制定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理论和政策，如毛泽东同志所做的那样，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后的国民党，就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参加和领导大会的许多共产党人被选为这个改组后的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

在大会开会期间，接到伟大的列宁逝世的消息，大会决定：一、电唁苏联致哀；二、广泛宣传列宁生平之事业；三、休会三日，以示哀悼。

这次大会以后，由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中做了广泛的群众工作和组织工作，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和群众有联系的政党，并使它的组织得到迅速的发展，党员的数目大为增加。它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迅速提高了。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也扩大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无产阶级开辟了一条通向农民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广东农民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

① 《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157页。

共产党人在广东有极高的威信，广东成为全国革命青年向往的革命中心。大会以后全国革命运动日趋高涨，这次大会就在实际上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 中国革命要向前发展并取得胜利，单是组成一个革命联盟还不够，还必须建立起革命的武装。国共合作后，在我党的倡议、领导和推动下，在苏联的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广州创立了黄埔军校。毛泽东同志当时极力主张我党选派党员到军校工作学习，以培养党的武装骨干。党派周恩来、叶剑英、聶荣臻、譚代英、肖楚女等许多重要干部先后在军校担任政治教育工作，并建议学习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军校的许多学生也是党从各地选派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他们是军校的革命骨干。

周恩来同志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他领导和依靠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军校建立了“中共黄埔特别支部”，在师生中还组织了革命青年的先进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以团结教育广大师生，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了提高学生的阶级觉悟，武装学生的思想，周恩来同志在学校经常讲课或作报告，讲解中国如何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压迫以及如何解除工农群众的痛苦，推翻这些压迫的途径。在他作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武力与民众》等讲演中，还精辟地分析了军队的来源，军队的阶级性，革命军队和反动军队的根本区别，他特别着重指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军队要为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周恩来同志还在军校建立起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把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了起来。

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干部，成为当时建立革命武装的基础。

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我党组织和领导工农群众运动，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党也进一步加强对工农运动的领导，于是，全国工农运动又逐步恢复和发展起来。

“二七”惨案以后，工人运动从全国范围来看正处于低潮阶段。一九二四年二月七日，在北京秘密召开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这时，中国共产党为了恢复被摧残的各地工会组织，采取了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即在工人中成立十人以下的秘密小组，各小组互相之间不发生关系，工会干部只和小组长接头。在环境较好的工厂中，则可召开小组长联席会。同时，也用公开合法形式团结和组织群众，如邓中夏、恽代英等同志在上海办“工人补习学校”、“沪西工友俱乐部”及“工人进德会”等。所有这些工作方式获得了一定成效，许多工会都因此而恢复、保存和发展起来。

广东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统治下，当“二七”以后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期间，工会组织仍能合法存在；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工人运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九二四年五月上旬举行广州工人代表会，通过了十二个决议案，并决定设立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广州沙面数千工人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妨碍中国人民出入沙面租界自由的新警律，后来并有中国籍的巡捕罢岗。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终于迫使帝国主义取消了新警律，而取得罢工的胜利。八月十七日复工，八月二十日工人代表会决议组织工团军，加强工人组织的力量。这次罢工的胜利，不仅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哄动了广东、香港，而且对中国中部和北方的工人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沙面罢工是工人运动由低潮转向高潮的征兆。